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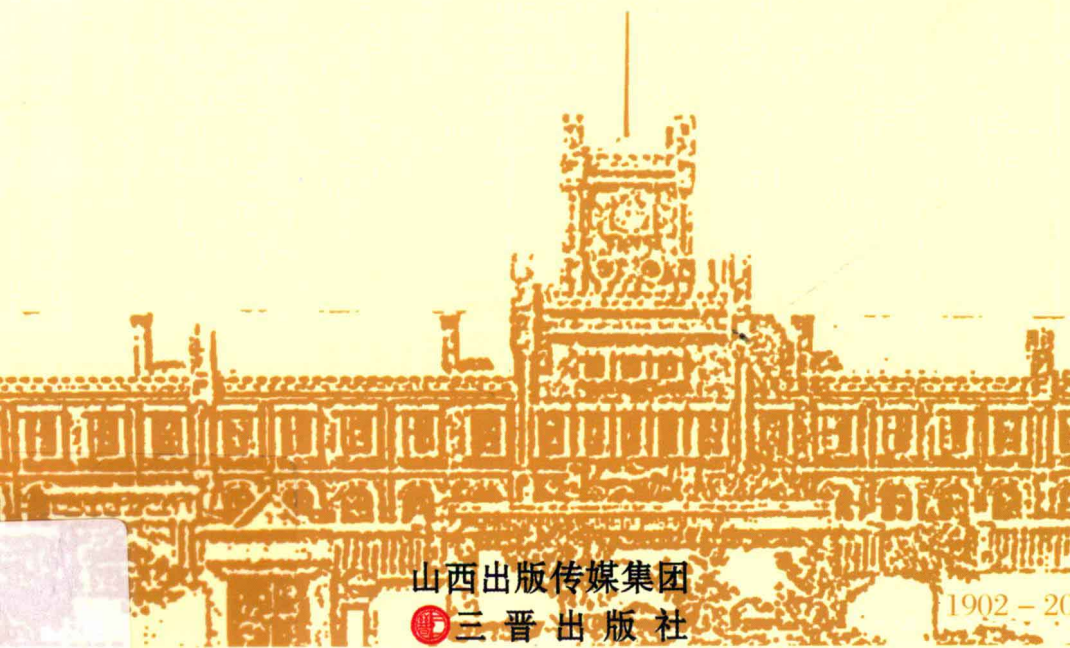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宋代福建庄学研究

SONGDAI FUJIAN
ZHUANGXUE YANJIU

杨文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1902 - 20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宋代福建庄学研究

SONGDAI FUJIAN
ZHUANGXUE YANJIU

杨文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代福建庄学研究 / 杨文娟著.——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57-0529-4

I. ①宋… II. ①杨… III. ①庄子—研究②道家—哲学思想—研究—福建省—宋代 IV. ①B223.5②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445号

宋代福建庄学研究

著 者: 杨文娟

责任编辑: 解 瑞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 - mail :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29-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201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将迎来 110 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 110 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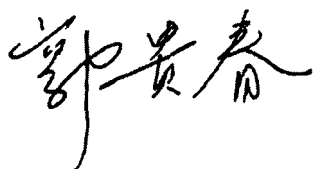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

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郭贵春' (Guo Guochun).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郭贵春 (1)
前 言	(1)
第一章 宋代福建的文化背景与《庄》学繁荣	(6)
第一节 新儒学兴盛	(7)
第二节 道教政治化	(12)
第三节 佛禅风盛行	(17)
第四节 福建文化的繁荣	(22)
第五节 庄学发展概况	(28)
第二章 北宋新学思潮下的以儒解《庄》	(38)
第一节 性命之学	(41)
第二节 道体理论	(55)
第三节 适时应变	(62)
第四节 汇通儒道	(71)
第五节 旁引曲证	(81)
第三章 朱熹对庄子及其相关问题的精辟论说	(87)
第一节 对庄子的理解与评价	(88)
第二节 对庄子相关问题的关注	(102)
第三节 对庄子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125)
第四章 《庄子口义》的三教融合思想(上)	(130)
第一节 艾轩学派的庄学传统	(130)

第二节 庄儒融合	(137)
第三节 理学入庄	(144)
第四节 愤世和“异端”之书	(154)
第五章 《庄子口义》的三教融合思想(下)	(163)
第一节 庄禅互证	(163)
第二节 以文评庄	(182)
第三节 流传及影响	(203)
结 语	(208)
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18)

前言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 and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支柱，二者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征，道家思想则倾向于自然、超逸，两家可谓是各有千秋。在发展过程中，儒道两家既互相对抗，又互动互补，几乎支配和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生动的面貌。

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无论是在中国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就哲学而言，庄子是“中国四大圣哲之一”，^①并且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②就文学而论，他也以《庄》书弘大而辟、深宏而肆的内容及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语言而成为极具魅力的文学天才。总之，《庄子》以其众多而深邃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奇特而精彩的篇章，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庄子思想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便成为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必要环节。从本世纪初以来，作为一种具有科学理论形态的庄子思想研究，一直是个十分活跃的学术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挖掘着《庄子》，力图把庄子的智慧融进现代生活。

据方克立等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900—1949）统计，五十年间共发表有关庄子论文和论著 167 篇（部）。这一时期庄学研究既承前代乾嘉朴学之余绪，又借西学东渐之时风，在校勘注释、义理阐发、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期在校勘注释方面的业绩最大，马叙伦《庄子义证》、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当为代表。王先谦《庄子集解》、陆毓崧《庄子集注》也很有特色。传统的考据之作则有马其昶的《庄子故》。在章太炎的《庄子解故》、《齐物论释》、严复的《〈庄子〉评点》以及梁启超的论庄文章中，读者能感受

① “中国四大圣哲”是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参见台湾黄锦鍠《庄子及其文学》邱燮友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 年版。

②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语，转引自陆钦《庄子通义》，第 1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到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浸染,而朗擎霄《庄子学案》则是第一部系统利用西方思想阐发庄子思想的论著。

1950—1965 年为现代庄学发展期。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一时期庄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大,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明显黯淡。刘武补正王先谦《庄子集解》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和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都具有立论严谨、考证翔实的特点,实为那个年代里不可多得的著述。

从 1977 年以来的二十余年,是庄学的鼎盛期。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庄学研究专著近五十多部,论文则有一千五百多篇,总量超过了前两个时期。专著大致可以分为校注考译释、理论研究、工具书和论文集四大类。崔大华《庄子歧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曹础基《庄子浅注》、朱季海《庄子故言》、钟泰《庄子发微》、方勇师与陆永品先生合著的《庄子诠评》等都颇具特色,堪称《庄子》注释方面的力作。本期的考证学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孙以楷、甄长松的《庄子通论》为代表。综合研究方面有张恒寿《庄子新探》、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庄学研究》、陆永品《老庄研究》、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陈鼓应《老庄新论》等等。本期的庄子传记,有颜世安《庄子评传》、汪国栋《庄子评传——南华梦觉话逍遥》等。用时下流行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阐释庄子文风,则以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张石在《庄子与现代主义》为代表。^①

事实上,面对像《庄子》这样的传统经典著作,如果只停留在对其字句的训诂与阐释上,或者只注意自己的研究而对前辈学者的丰硕成果置之不管,都是不合情理的。应该说,分析、评价各个时代的庄学成果,不但是庄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探讨同一时期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发展也大有助益。但是,综观以上载录,除了朗擎霄《庄子学案》^②开辟出《历代庄学述评》一篇文章,陈绍燕《庄子的智慧》^③、萧蓬父《中国哲学史料源流举要》^④、谢祥皓《庄子导读》^⑤等书的部分章节介绍了历代庄学研究的概况以外,在上个世纪,还没有庄学史的专著。

2003 年,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合著的《中国庄学史》出版,2008 年,方勇

① 参吕薇芬、张燕瑾《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年版;包兆会《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② 朗擎霄《庄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

③ 陈绍燕《庄子的智慧》,第十四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④ 萧蓬父《中国哲学史料源流举要》,第 125—128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⑤ 谢祥皓《庄子导读》,第 45—66 页,巴蜀书社,1988 年版。

师《中国庄学史》面世并获得广泛好评,这些都是庄学史上可喜的成果。至于阶段性的庄学论著,则有宗明华的《庄子与魏晋文学》^①、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②、北京大学张梅的博士论文《宋代庄学研究》。这些论著主要是从学史的角度加以关注,对《庄子》注文的探讨并不作为重点。要想处理好当前研究面临的窘境,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那些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诠释文献上,对其中的一些典型个案作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为什么一部《庄子》,却形成了如此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系列注本?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文本的多义性。《庄子》是一部寓抽象思辨于可感形象之中的著作,其中的许多概念书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感性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表现其内涵,这就给解释者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其次,是解释者的思想传承。解释者的认知结构是接受两方面的思想文化影响加上自己的选择形成的,一个是历时的影响,即接受历史的传承,一个是共时的影响,即他所处时代社会思潮的浸润。每一个解释者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文化网络之中,进行着接受和选择,从而构成自己的认知结构。由于他们的认知结构各有不同,自然会对《庄子》作出各不相同的解释。^③ 第三,是解释者的目的。每一个解释者都处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当他以特定的身份来对《庄子》作解时,往往会有意识的从自身阶层的利益出发,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说会从哲学高度来论证其主张或社会现实的合理性。例如郭象就从玄学的角度出发,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以其“独化”之旨、“性足”之说来阐释《庄》文,从而论证自己“名教即自然”的命题。成玄英则从道教观点出发,用“重玄”论来解释《庄子》,通过“称意而谈,清言曲畅”,达到了一种前人未曾触及的新境界。

正因《庄子》注本的丰富性,我们对其做个案研究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多把视点集中在郭象、成玄英、林希逸以及明清以后的注本上。可见,对《庄子》注的研究,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如吕惠卿《宋吕氏庄子义》、陈祥道《庄子注》、林自《庄子注》(除友勇师《中国庄学史》略有论及外)几乎没有学者给予关注。基于这一认识,本书选取宋代福建《庄子》诠释文献进行个案研究,以理清宋代庄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并透视出其所在时

① 宗明华《庄子与魏晋文学》,其中有“魏晋庄子学史概论”一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其中有“《庄子》在秦汉之世的传播和接受”与“魏晋名士与《庄子》解读”两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参张峰屹《〈庄子〉解释史上的差异现象及其根源》,见《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代的精神风貌。

宋代是庄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王安石、苏轼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儒、释、道三家都十分重视对《庄子》的研究。研究《庄子》的儒家学者有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陈祥道、林自、赵以夫、朱熹、林希逸、刘辰翁、吴澄等;道家学者陈景元有五种《庄子》学著作、褚伯秀也著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佛教学者景宜喜读《庄子》,并著有《庄子集解》^①。随着庄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庄学著作的数量也明显增加,与宋代文人出入三教、思想尚未定于一尊的学术空气相应,时人各以己意解庄,使庄学呈现出不拘一格、纷繁多彩的面貌。以儒解庄、以佛解庄,由阐发《庄子》文义到义理与辞章并重,形成了宋人注《庄》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宋代庄学不仅与前代迥异,还达到了“臻于极盛”之状态。正是在儒、道、释三教斗争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这样一个极其浩繁的《庄子》注释系统。据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宋元时期见诸著录的庄学研究者共有六十多家,著作有七十多种,当然这些相对于未刊行和未著录的著作而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现存的十几家宋代《庄子》注本中,福建学者的著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是因为宋代的福建,是政治活跃,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到了南宋,更成了当时人文精神的荟萃之所,在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宋代学者吕惠卿、林自、陈祥道、赵以夫的《庄子》注疏赖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得以保存,对吕、林、陈的庄学著述本文将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赵以夫的《庄子内篇注》也是一部多有“骇世”之语的著作,反映出了宋代庄学严重儒学化的倾向。^②南宋末年林希逸的《庄子口义》反映了福建理学学派——艾轩学派重视文章技法的特点,对《庄子》文章的文势、句法与篇章结构极为关注;同时与理学的发展相适应,《口义》又具有明显的三教合一倾向。朱熹也对庄子的思想与文字及其与之有关的问题作了颇多关注,在庄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以上几家《庄子》注本及其评论做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掌握庄子思想并发掘其理论精华,而且对理清宋代庄学的发展轨迹,进而准确的理解其思想意蕴也大有裨益。本书旨在从阐释者的诠释中理出其真实用意,从而透视出其所在时代的精神所向。

下面对本书的撰述宗旨及体例略加说明:第一,本书对宋代福建《庄子》注

① 《乾隆温州府志·仙释》、《光绪乐清县志·仙释》均有载录。

② 因其书残缺不全,再加上资料缺乏,对赵以夫的庄学思想暂不作详细论述。

释文献进行个案研究时,力争在广泛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因为这些文本内容读者并不熟悉,所以采用了较多的原文引用加材料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会使引文显得冗长,但却有利于对诠释者思路进行梳理,也有利于把握其整体理念与思想体系。第二,对于《庄子》文本固有的思想理念、注疏者注解的正误与方法得失,本书不作为论述重点。主旨在于借助对注本文献的分析,归纳和总结注疏者的思想与理论体系,从而凸现其所在时代的精神走向。第三,庄子只有专指《庄子》一书时,才加上书名号,如果有多种含义、或者既指书又带有其他含义均不加书名号。第四,汉末道教出现以后,曾依托于老子和《道德经》。魏晋南北朝以后,统称道教为“道”、“老”或“道家”等,唐以后的许多道教人士及学者,往往既称“道教”,又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老庄作认真的区分。本书讨论的宋代庄子学也是处在儒、道、释三教并行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所以,文中涉及的“道”、“道家”、“老学”也经常既包含道教,又包含老、庄道家。

第一章 宋代福建的文化背景 与《庄》学繁荣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和发展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和魏晋之后,思想空前发展的第三个时代,与汉、唐曾被并称为“后三代”^①。虽然宋代在疆域、国势等方面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但是其经济、政治、科技诸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严复曾说过:“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②英国的李约瑟曾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③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亦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持、军阀割据,“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④。为了重整封建伦常,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兴文教,抑武事”^⑤,欲“以文化成天下”^⑥。因而,宋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我们古代文化的发展态势时就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盛”。^⑦学术大师王国维亦云:

① 参郝经《陵川集》卷三九《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此“后三代”与夏、商、周三代相对而言。

②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三九,见《学衡》第13期,中华书局,1922年版。

③ 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分册,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④ 《宋史·忠义传序》。为避免繁琐,凡引用的古书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版本的,注释中一律省略。以下同。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

⑥ 赵与时《宾退录》卷九。

⑦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不逮也。”^①宋代文化既是对先秦、汉、唐以来传统文化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端，因而呈现出继往开来、百川汇海式的兴旺景象，进入了一个极其繁盛的阶段。邓广铭先生的话即可作为最好的概括：“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同样，处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的庄学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下面，我们具体论述影响庄学发展进程的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节 新儒学兴盛

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以来以世代簪缨和经学传家相标榜的门阀士族分崩离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主要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并在社会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宋仁宗亲政后不久，宋初建立起来的强化中央专制政权的那一套制度和措施，就不再起作用，宋朝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此时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外忧内患接踵而来。窘迫的时势，把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小批新兴士大夫阶层推上了政治的舞台。这批人是当时士大夫中的精英，他们大都出身贫寒家庭，在困窘中求学进取，并富于忧患意识。困窘的政治局势激起了他们对现行政治的反省，其自觉精神逐渐在社会上发生影响。所谓自觉精神，“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③。这些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文化主张和思想倾向都与六朝隋唐的士族知识分子迥然不同，他们以振兴天下为己任，具有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伴随着求变呼声的不断高涨以及庆历新政的一度实施，学坛上兴起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思潮的总倾向就是要求复兴中衰已久的儒学。然而，他们所提倡的儒学，并非自汉迄唐所延续下来的章句训诂、笺注疏义之学，当时的学者一面为儒学的衰微感到担忧，强调要通经学古，另一方面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

③ 钱穆《国史大纲》，第55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汉唐以来的经学。

孙复是专力从事宋学草创的第一人。自44岁开始,退居泰山,讲学授徒。庆历二年任国子监直讲,“讲学多异先儒”。他平生著述颇多,主要有《易说》六十四篇和《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这些著述,特别强调以“心”和“用”两个方面来改造和发展传统的儒学,大抵代表了此后宋代学术发展的方向。尤其是《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不独在《春秋》学,即使在整个宋代经学中,也是开风气之作。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①以孙复为首,其门人有石介、李建中、张洎等,皆以不惑传注,非议汉唐注疏之学著称于时。此外,还涌现出众多的疑传、疑经派学者,如范仲淹就对《春秋》三传表示不满,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胡瑗写成《周易口义》取代王弼注和孔颖达疏,撰出《洪范口义》以批驳伪孔《传》;欧阳修抨击唐人《五经正义》征引谰纬之书,著《毛氏本义》攻击毛萸、郑玄之失,撰《进士策问》质疑《周礼》的真伪,在《易童子问》中对《易传》的作者提出怀疑。正如李觏所说,“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②,当时的儒者大都具有一反传统经学的学术取向。

怀疑经传的思潮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它不仅引起了学术思想界重新研讨儒学经典的兴趣,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即自由解经。所谓自由解经就是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实际上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取舍儒经,解说经书。受这种疑经思想的影响,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都“各出新意以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③。这种解经专凭己意,重在发挥义理的方法虽不免有臆测之弊,然而,它却为思想家们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次思想运动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造成了学术史上罕见的活跃气氛,这一风气经由周敦颐、程颢、程颐、王安石、苏轼等思想家的大力推进,愈加兴盛,终于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

汉学发展到唐代已经陷入了绝境,学者治经,都囿于旧说,不敢越雷池半步,孔颖达编《正义》后,汉学即不再有前进的可能。唐代的思想界虽然出现了儒、道、释三教鼎立的格局,但佛教与道教盛极一时,大有压倒儒学之势,且在相当大的领域里夺取了儒学的思想阵地。在儒家与道家、孔孟与老庄之间,时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壬申》条。

② 李觏《李觏集》卷二六《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

③ 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紧张、时而缓和的对立关系始终得不到实质性改变的时候,外来的佛学已经借助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老庄学说建构了禅宗这一中国化的思想体系。禅宗佛学的这种建构方法和发展趋势在儒学正统文人看来足以构成对中国固有思想的威胁。佛教提出的有关宇宙和人生的许多命题,为古老的汉学所不曾有,要战胜佛教就必须对这些命题作出自己的响应。

赵宋承五代之弊,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思想文化的紊乱,儒学在释道二家的裹挟之下,形势十分被动。儒学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另辟新径,至此亟须汲取新的思想养料从而在理论上胜之一筹。

正如陈植锽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所说:“现实中越来越深刻的民族危机唤醒了知识分子对以尊王攘夷为己任的儒家为主体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忧患意识,战场上的失利又逼使他们通过大力复兴传统儒学而排挤佛、老异端的激烈方式排泄郁积在胸中的民族感情,以求在文化上征服并消灭‘夷狄’。”^①现实中的民族矛盾与思想文化界正统儒学地位的下降,使士大夫们把对佛老异端的排斥等同于“尊王攘夷”,即对民族文化自尊心的维护。

此外,宋初道丧文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承担起重建儒家学术的重任,还要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性,所以文人有非常自觉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释道空谈心性理论,因果报应,自然没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这也成为知识分子抨击它的原因之一:“苟释氏能福乎人,王公大人今日富贵,何不由释老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师之道、之教也。”^②

抨击异端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消灭夷狄、维护民族自尊心,为什么还会涉及道家呢?

宋代学者柳开在《韩文公〈双鸟诗〉解》中对“双鸟”的解释可以解开这个疑惑。他明确地把“双鸟”理解为外来异端,一者为释,一者为老。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而且兴建寺院,劳民伤财,又宣扬超脱今生、轮回报应,因而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排斥和攻击。排斥道家的原因柳开则又作了另外的解释。道教崇尚羽化成仙、长生不老,其思想虚妄荒诞,在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面前,确实与儒家士大夫投身世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思想宗旨相违背,自然要遭到他们的强力反对,但是,道教毕竟不同于佛教,是中国本生土长的,于是柳开又对两鸟为什么都“从海外来”作了如下一番解释:“且聃之昔在中国也,不以左道示民

① 陈植锽《北宋文化史述论》,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柳开《河东集》卷三《重修孔子庙垣疏》。

矣。暨西出函关,入身毒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革其心。而后教乃东来,与昔之书果异耳,是非中国之兴也。故韩俱云若是矣。”柳开的意思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出关以后为了化胡而走了样的道教,而不是《老子》书本身,这样,在维护儒家学术思想之纯粹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当然,事实上道教并非自西而来,但是老子西出函谷关的传说却给学者将道教看作异端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维护了本民族的自尊心。

石介在《中国论》里也这样说:

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其佛者乃说曰:“天有堂,地有狱,从我游则升天堂矣,否则挤地狱。”其老者亦说曰:“我长生之道,不死之药,从我游则长生矣,否则夭死。”^①

石介此处抨击的也是道教宣扬长生不老的荒诞虚无之论,这里的“老”指代道教,而并非《老子》一书。^②

可见,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知识分子出于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心,便强烈要求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可以说庆历之际出现的排斥佛老运动既与当时学界要求振兴儒学的呼声密切相关,也与外族入寇、民生凋敝、财用匮乏等一系列社会现实矛盾日趋激烈不无联系,是现实的民族矛盾和尊夏攘夷的传统文化心态在士大夫心目中错综交织的结果。它不能不唤起那些富于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们对儒家主体文化的认同情绪,从而在思想学术领域激发起他们排斥“异端”的潜意识。他们试图通过大力复兴儒学和排斥佛老的方式,来排泄郁积于心中的民族感情,以求在文化上征服夷狄。但是由于老氏毕竟是本土文化,所以庆历之际学术界抵斥异端的矛头主要指向佛教。比如李觏的《潜书》十五篇、欧阳修的《本论》,主要也都是排佛。即使涉及道,也多指道教,实在不得已对老子进行批判,也把目标指向西出函谷关化胡,继而被夷狄之人歪曲了面目的教主,而非《老子》一书的作者。

学者们对道家的这一态度,还有另外一层内在的原因,就是儒学内在变革的需要。儒家哲学主要是关于伦理与社会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哲学,但是在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儒家明显逊色于佛、道两家。随着佛老的流行,两家的哲学思想日益精密,有成就的学者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宋代儒学已面临巨大的危机,要复兴儒学,就必须弥补自身的缺陷,即所谓“修其本

①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② 参张梅博士论文《宋代庄学研究》电子版。